

军统特务暗杀行动录

致远 佐恩编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军统特务暗杀行动录

致 远 佐 恩 编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军统特务暗杀行动录

致远、佐恩编著

责任编辑 刘连峰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联)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110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9,400册

统一书号11105·174定价1.10元

前 言

这不是一本为了吸引读者而故弄玄虚的历史小说，而是一本有翔实史料可据的知识性读物。

恐怖的政治总是与专制的政权相伴随的。一九三二年，以戴笠为首的军统特务组织，为了适应蒋介石专制统治的需要，应运而生。然而专制不得人心，它遭到了革命人民和进步民主人士的广泛不满和反对。于是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军统特务大打出手，暗杀共产党人，戕害进步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出现了刺杀吉鸿昌、史量才这样的历史事件。他们企图通过恐怖手段来扑灭进步势力，扼杀民主空气，在他们的枪口下，不知有多少人突然丧生。这些事情从发生到现在，已有半个世纪了，我们把它揭露开来，对于帮助人们了解当时的国内政情，珍惜今天的民主与自由的权益是有益的。

但历史是复杂的，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工具的军统，随着蒋介石的政策需要，也在不断变化着自己的行动目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吞并中国的步伐。国难当头，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全民族聚集在抗战的旗帜下，反击日本侵略

者。在这民族的危急关头，国内沉渣泛起，一些旧军阀、政客，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投入到日本侵略者的怀抱。他们在侵略者的枪刺下，建立汉奸政权。他们要做儿皇帝，这就严重地威胁着蒋介石政权的利益，为蒋所不容，于是就出现了刺杀张敬尧、汪精卫这样的历史案件。我们把这类事件披露出来，对于人们了解那段时期纷繁复杂的政情也是有帮助的。

在军统的历史上，他们的恐怖行动是难以数计的，这里我们所选的这些案件，如果对于帮助人们从一个侧面更多地了解那段历史，算是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不少档案资料、文史资料、回忆录以及其他的著作。在这里，我们对这些文章的作者和材料收集整理者，顺致谢意。

著 者

目 录

国民大饭店枪击案·····	(1)
——军统特务杀害吉鸿昌将军始末	
亚尔培路血案·····	(21)
——杨杏佛先生被害纪实	
沪杭公路上的惨案·····	(30)
——史量才被杀记	
费巩失踪事件·····	(41)
松林坡惨案·····	(46)
宋绮云遇害·····	(54)
杨杰被刺真相·····	(59)
王亚樵·戴笠·蒋介石·····	(67)
送古董的刺客·····	(75)
河内刺汪案·····	(86)
六国饭店的枪声·····	(118)
刀砍傅筱庵·····	(134)
一次失败的制裁·····	(143)
“租界大亨”之死·····	(154)
王克敏遇刺记·····	(160)
暗杀李宗仁的阴谋·····	(170)

国民大饭店枪击案

——军统特务杀害吉鸿昌将军始末

一九三三年秋天，国民党军统为加强华北地区的特务活动，将所属北平站编制扩大，成立行动组，由白世维任组长，并增加人员和武器装备。与此同时，军统天津站也增设行动组，由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兼任组长，专门从事探刺情报和暗杀活动。后来王天木因其他原因被军统判无期徒刑，其站长和行动组长职务由王子襄接任。王子襄原是天津一个医生，毕业于北平协和医科大学，后被军统看中，罗致入网，并成为骨干。

军统北平站和天津站都增设行动组后的第二年，即一九三四年，军统根据国民党政府的旨意，下达暗杀吉鸿昌等人的命令，并交军统北平站负责。因吉鸿昌住在天津，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接到命令后，专门赶到天津，与王子襄商量。

当时，国民党政府以“抗日”自榜，企图逃避人民对其不抵抗政策的指责。因此，当王子襄听说要暗杀吉鸿昌后，不禁大吃一惊，他问陈恭澍：“吉鸿昌是抗日将领，曾在察

东一带与日军作战，并收复沽源等地，事实俱在，怎能与张敬尧之辈相提并论？”王子襄的疑问，反映了作为抗日将领的吉鸿昌在全国的深刻影响。

吉鸿昌，原名恒立，别号世五，河南扶沟县人。一八九五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家。一九一三年，十八岁的吉鸿昌加入冯玉祥的部队，由于作战勇敢，被称为“吉大胆”。在十几年的部队生涯里，他当过士兵、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参加过新老军阀之间的许多次战斗，对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有所认识，对把权力建筑在人民血肉之上的军阀，非常不满。

一九三〇年下半年，蒋介石在结束军阀混战后，对鄂豫皖红色区域组织围攻，吉鸿昌奉命率部向红军作战。吉鸿昌的部队向来被称为“铁军”，在军阀混战中是赫赫有名的。可是，这支“铁军”一与红军交战，就连连吃败仗。是武器装备不如红军，还是士气不如红军？正当他苦苦思索这是为什么的时候，在他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建议他到上海与党的负责同志见面。经过我党的帮助，吉鸿昌清醒了，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出身行伍，戎马半生，身上受轻重伤二十余处，但这些血都不是为工农大众流的，而是为军阀流了！前半生已矣，后半生当追。掉进泥坑的人想爬出来真不容易，我是用眼泪和鲜血才找到了‘阶级革命’这四个字的。”

从上海回到前线后，吉鸿昌化装成小炉匠，到苏区去了解情况，所见所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回来

后，他决定撤兵罢战，不为蒋介石卖命。蒋介石见他按兵不动，屡次发电报催他作战，吉鸿昌收到这些电报，愤然把它撕得粉碎。

吉鸿昌的反叛行为，激怒了蒋介石，他派人收买吉鸿昌部队里的中级军官，并派军队威逼吉鸿昌交出军权。一九三一年，吉鸿昌被解除军职。蒋介石原想杀他，但知道他素得民望，拥戴他的人很多，杀他必然会引起乱子，就用逼他“出洋”的手段，以除此心腹遗患。

一九三一年九月，正当吉鸿昌准备从上海出洋考察的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在此民族危机面前，他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带兵北上抗日，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他只得怀着悲愤的心情去欧美等国和苏联访问，经过实地考察，他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增强了爱国的热情。

一九三二年二月底，吉鸿昌从海外回到上海。不久，即与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根据党的指示，他一面参加东北抗日救国后援会的活动，一面秘密派人和仍在湖北地区被迫进攻红军的旧部取得联系。是年八月，他只身前往湖北黄陂，收集旧部，组织起义，因遭国民党军队包围，起义失败，最后只带出十几个人投奔红军。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吉鸿昌又潜回上海，并在上海正式参加共产党。入党以后，他到天津继续联络旧部，进行抗日反蒋活动，从事武装抗日的准备工作，蒋介石得知吉鸿昌的行动后，公开下令对他进行通缉。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更为

猖狂。一九三三年一月初，日军攻陷山海关，二月下旬，从通辽和绥中基地分三路进犯长城北部和东部整个地区，以及沿长城的一切重要关隘。在民族危机面前，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准许日军用飞机或其他方法视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予以便利。协定规定的日军撤至“长城线”，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承认日本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及东三省、热河地区的“合法”性，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大片国土拱手送给日本，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平津有随时被侵占的危险。

为了反抗日本的侵略，五月下旬，冯玉祥在张家口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同盟军通电全国，主张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一致武装抗日，收复失地。同盟军由于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迅速由几千人扩大到十万多人。

同盟军在吉鸿昌指挥下，接连打胜仗，收复宝昌、沽源、多伦，伪军纷纷反正，使日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遭到沉重的打击。战斗刚一结束，北平日本使馆武官柴山就威胁何应钦说：“日方对此事，认为有违《塘沽停战协定》，请予注意。”同时，日方向同盟军总部提出“让出”多伦的无理要求。同盟军接到他们的所谓要求后，立即提出要他们撤出热河和东三省的反要求，并加强对多伦的防守。

但是，当同盟军攻克多伦后，国民党政府即下令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三路进攻同盟军。七月二十八日，蒋介石

石、汪精卫更无耻地从庐山拍电报给冯玉祥，提出最后通牒式的四项要求：一、“勿擅立军政名义”；二、收复察北是“妨害中央边防计划”；三、“勿滥收散军土匪”（实际用意是不准收编扩大抗日军队）；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祸”。与此同时，何应钦通过柴山和日本特务机关头目土肥原贤二勾结，商订了协同进攻抗日同盟军的计划，国民党政府调集的军队达二十多万。

八月初，面临国民党大军压境的局势，吉鸿昌、方振武和大多数同盟军将领，主张团结抗敌，坚持到底，坚决执行同盟军“外抗暴日，内除国贼”的行动纲领，立即通电讨伐蒋介石，但一部分将领鉴于形势不利，不愿牺牲实力。八月十四日，总司令冯玉祥辞职。方振武出任代理总司令，此时同盟军人心动摇，已不容易收拾。

根据党的指示，吉鸿昌和方振武对部队进行改编，将民众抗日同盟军改称为抗日讨蒋军，继续抗日。不久，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关东军联合向他们围攻，把他们逼至山谷里。吉鸿昌眼看突围无望，为别谋抗日出路，遂决定于十月十六日，和方振武一起，与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谈判。

谈判地点在顺义附近马家营，和吉鸿昌、方振武同行的有几十名神枪手。吉鸿昌、方振武没有想到，随着“谈判”的结束，他们被关进了潮湿的黑屋，随行的神枪手们也被缴了械。

何应钦接到商震的电报后，命令商震立即把他们押往北平审问。吉鸿昌看到情况不妙，悄悄对方振武说：“我们

这五尺之躯对国家还有用处，不能老老实实在地给他们干掉。”

两人决定在途中逃跑。

当押送他们的汽车开到离北平不远的孙河时，天色已渐渐暗下来了。吉鸿昌看到周围地形复杂，便于隐蔽，便朝方振武使了个眼色，又向旁边的水厂撇了撇嘴。方振武会意，假说要上厕所，请求停车。押车的慈善团体代表问吉鸿昌是否同去，吉鸿昌摇摇头。他们看到作为重要人物的吉鸿昌没有下车，也就不派人跟方振武下去。结果，方振武逃走了。

车上的士兵见方振武逃走，都责骂是吉鸿昌出的主意。吉鸿昌向他们宣传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战绩。士兵们非常敬仰。他们知道，只要吉鸿昌一到北平，就会被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扣押。汽车临近北平时，这些士兵见四下无人，便叫吉鸿昌下车逃走。

吉鸿昌脱险后，潜回天津，在天津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他根据党的指示，同宣侠父、南汉宸同志和任应岐将军等，联络各派抗日人士，在天津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任主任委员。吉鸿昌还和宣侠父等创办《民族战旗》杂志，作为大同盟的机关刊物（这个刊物遭敌人破坏，被迫停刊后，曾改名《华北烽火》、《长城》等出版）。

一九三四年三月，吉鸿昌在宣侠父陪同下，秘密去上海，向党组织汇报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工作，又接受新的任务。

吉鸿昌的这些爱国抗日活动，都被当作“叛国”的罪行

记录在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的笔记本里。当时，军统局下令“制裁”的对象有好几个，命令他只要遇有机会，随时都可以行动，不必分先后，但陈恭澍竭力主张把吉鸿昌列入“制裁”名单的首位。

怎样刺杀吉鸿昌？陈恭澍要军统天津站进行侦察，具体工作由所属情报组长吕一民负责。这是第一步。他还提出三项具体要求：

一、收集吉鸿昌在天津从事活动的所有情报；如有所获，无须处理，即将收到的原件交给他。

二、全力侦察吉鸿昌的个人行动，包括他的住址、行经路线、停留地点等。

三、特别留意与吉鸿昌有过接触的所有人，以及这些人的一切资料。

吉鸿昌住在天津法租界花园一号。法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军统特务都加强了对他的监视。法租界巡捕房在他住宅门口安上巡捕，明为“保护”，实际上是监视他的行动；国民党军统特务则跟踪、盯梢。法国巡捕都是中国人，吉鸿昌利用各种机会从思想上开导他们，不少巡捕经过他的帮助，都在暗中保护他，当国民党军统特务问他们经常到吉鸿昌家里来的是哪些人时，他们说：“都是些吉总指挥的部下。”

有一天黄昏，吉鸿昌从外面回来，刚走到大门口时，站岗的巡捕朝他努了努嘴，顺着巡捕的视线，他看见一个伪装成小贩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不停地窥视着大门，吉鸿昌灵机一动，装作要买东西的样子，向他走去，那个特务看见吉鸿

昌锐利的目光，知道身份已被识破，赶紧溜走。

为了安全，吉鸿昌转移了住处，并在惠中饭店开了房间，以打牌九作为暗中交谈工作的掩护。他频繁地与各方爱国人士联系，当有人问到他整天在干什么时，他的夫人机警地说：“他们几个下野的军阀，能够干出些什么事情？还不是整天花天酒地地鬼混，能有多大出息。”过了几天，吉鸿昌又转移到其他饭店，仍然通过牌桌进行工作。

此时，国民党军统特务准备刺杀吉鸿昌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陈恭澍亲自带军统特务王文等从北平赶到天津。军统天津站站长王子襄专门拨出一辆汽车，带他们熟悉天津的道路，从干道到支线，甚至连不能畅通无阻的地方，都一一指明。经过几天“兜风”，特务们对天津的道路已十分熟悉。

陈恭澍等住在天津特一区的小白楼。由于吉鸿昌经常变换住处，又有群众的掩护，负责侦察的吕一民虽经多方努力，仍然摸不清吉鸿昌的线索，因而也更想不出刺杀他的办法。特务们陷入苦恼之中。

由于吉鸿昌在天津的抗日活动越来越活跃，给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政府造成很大威胁，军统局几次责令陈恭澍加速“制裁”。陈恭澍接到电报，叹了口气，感到在上级面前难以交代，不得不又一次召开会议，同王子襄、王文、吴萍、吕一民等一起研究对策。

王文认为：“吉鸿昌的活动范围，离不开西北军，我们只要顺着这条线下功夫，相信必有发现。比如，在我们的亲

朋故旧中，说不定有现成的关系。”听了王文的发言，众特务都说这个主意妙，但谁有现成的关系呢？他们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

吕一民说，他曾接触过两个人，过去都任过高级军职，一个是保定军校毕业，一个是老行伍出身，但要他们搜集情报，他们都不肯。其中一个是河南人，与吉鸿昌是同乡，可能还相识。吕一民表示再去努力一下，争取打破目前的僵局。

会议结束后，陈恭澍跑到王文面前，问他：“你说从西北军这条线追下去，总可以找到头绪，是不是在你的亲友中，已经有了这种关系？”

王文说，他有个朋友是石友三的随从副官，现住在天津日本租界石友三的家。王文还答应陈恭澍，设法从那个副官身上获得线索。

不久，军统天津站站长王子襄在试验杀人毒剂时中毒身死，天津站一时找不出站长，就将吕一民的行动组暂时改属北平站指挥。

吕一民经过努力，在天津的侦察活动逐渐有所进展。他物色到两个与吉鸿昌有交往的旧军人：一个是河南人，叫郑恩普，曾参加过樊钟秀的“建国豫军”，一九三〇年曾任新编第三军军长；另一个是河北人，叫傅丹墀，曾任襄樊镇守使等职。陈恭澍得知这一情况，非常高兴，他亲自出面，与这两个人谈话，谈话时，他不用南京“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主任和南京《中国日报》记者的伪装身份，干脆亮出军

统北平站站长的牌子。通过谈话，陈恭澍认为这两个人对刺杀吉鸿昌很有用处，就将他们收买为特务，让他们负责军统天津军事组，要他们及时提供有关吉鸿昌的情报，但没有告诉他们有关暗杀吉鸿昌的计划。

一天，郑恩普匆匆跑到小白楼，对陈恭澍说：“明天下午三点钟，吉鸿昌约我和傅丹墀到法租界交通旅馆见面，说是要给我们介绍两位新朋友，并研究出发前后的有关问题。”所谓出发，即吉鸿昌曾要求郑恩普到河南西部，傅丹墀去河北南部联络旧部，进行抗日活动。

陈恭澍得到这一情报，感到机会来了，忙问：“吉鸿昌给你们介绍什么新朋友？”

“不知道。”郑恩普说。

陈恭澍又问：“约你们在饭店的哪个房间见面？”

“来人通知说在四楼三十七号，还特别叮嘱，记住‘四三七’这个号数就行了。”

机会难得。陈恭澍等待它已经好久了。送走郑恩普后，他立即召集吕一民、吴萍、王文等商量行动计划。决定由王文、吴萍负责现场侦察，王文负责刺杀。王文因从北平来天津，没有带武器，手枪就由吴萍提供。这是一支德国造的盒子枪，内装十粒子弹。

商量完毕后，这批特务就赶到交通旅馆，准备开一个房间，熟悉一下现场，但四楼已全部住满，他们只得在三楼开个房间。然后，特务再到四楼四三七房间外面侦察，一个晚上下来，房间里一点动静也没有，灯也没亮过，似乎没有人

住。他们怀疑那个房间压根儿没有订出去，或者是有人预定了没有住进来。

他们还到现场周围的环境进行了细心的观察，

从楼下搭电梯到四层，走出电梯到四三七房间门口，只有十几步路；再从四三七房间门口走到下楼的阶梯口，也是十几步路。

上上下下轮流有两部电梯，开电梯的是身着制服的男服务员。

从四层沿着楼梯走下来，共有八个楼梯，七十四梯级，每一楼梯都是九级，只有最下层的那个阶段，是十一级。快步往下走，一分钟可到达地面。但光线很暗。

下午三点，满街都是人，只要一出大门，随便往哪个方向走，或跨过马路，转眼间就不见人。

后来，他们通过贿赂，退掉三层的房间，在四层开了个四二二房间，与四三七斜对面，从门缝里看出去，仍然没有一点动静。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九日下午，特务们早早地吃过午饭，就分头开始行动。陈恭澍在和交通旅馆同一马路的紫竹林咖啡室里指挥。

三点零五分，没有动静。三点一刻，仍没有动静。陈恭澍有点急了，叫茶房又端来一杯热咖啡，他拿出火柴盒，以数火柴梗来掩饰内心的不安。~~三点半差一分钟~~陈恭澍急得连火柴梗也数不下去了，不时地向门外张望。正在这时，吴萍从门外进来，垂头丧气地说：“~~四二二房间是空的~~。”